

藏漢衝突何時了？

●王小強

女士/

白南風與我合著的《富饒的貧困》被克拉克·克諾(Angela Knox)翻譯成英文，由著名的麥克米蘭公司在英國出版了。倫敦大學的東方和非洲研究院邀請我們參加“西藏一九五〇～一九九〇”學術討論會。白南風因參與天安門運動期間“三所一會”的“六點聲明”，至今尚在拘審。我與白十年的朝夕共處，深知其高尚之內心。其實從這書中也可看出，作為一學人，專門研究社會、文化進步的他，為中華民族之振興，着實處心積慮，殫精竭誠。希望政府能弄清其對國家、人民之忠誠，早日放他回家。

我國雲貴一帶也有不少少數民族，他們保持着不同於漢族的風俗傳統和生活習慣。抑或由於居住分散或其它什麼原因，他們的文化大多沒有形成完整的封閉系統；或在語言文字，或在社會組織，或在科學技術等方面，有賴於漢文化以滋補充之處頗多，所以只要沒有物質利益糾紛，在文化層次上較容易與漢文化相處。這種現象有些類似非洲一些分散小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吸收與融合。換言之，“不完整”等於“不封閉”，等於“開放”。

藏文化截然不同。一個佛教中，天文、地理、曆算、歷史、哲學、文學、藝術、建築、醫學、政治、經濟、宗教、禮儀、倫理、道德……包羅萬象，應有盡有。與任何古代的成熟文化一樣，藏文化成就了一整套完全獨立且獨特的封閉系統。其歷史幾乎與漢文化一樣長，實際上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與漢文化平行發展起來的獨立文化。要想使這樣的文化融合，消亡於外來文化之中，就像要使印度融於英國，中國

融於“大東亞共榮圈”一樣不可能。征服？一個過於簡單的事實：迄今為止沒有一代非藏族能健康地繁愆在這世界屋脊。一九八四年我們在西藏考察，偶然遇見“甲諧”，一種古代的民間歌舞：草原上一隊古裝優伶，沉悶的鼓聲中，滿頭白髮迸出蒼涼、高亢的歌——山是從哪裡來的？河是從哪裏來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同行的《人民日報》記者盧小百被震撼得滿臉熱淚。聽說過《哥薩爾王傳》嗎？世界歷史上最長的一部史詩，超過荷馬史詩和天方夜譚。這是一種與漢文化一樣不死的文化，想它死也死不了的文化。

因為藏漢衝突的實質是文化衝突，所以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利益在經濟、政治層面上的調整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一九七八年撥亂反正，民族、宗教政策都作了很大調整。又是減少漢族幹部，又是增加財政支援，還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但這些只不過是撥了“文革”之亂，而返五十年代之“正”，並沒有有一種改革精神在民族、宗教方面有何創新。結果是“花錢不買好。”不少漢族幹部也大惑不解：我們不僅沒從西藏佔到什麼便宜，相反白花花的銀子大把大把往裡扔，結果還落個渾身不是。耐人尋味的是，一九八七年前任黨委書記伍精華（四川，彝族）在西藏自治區成立若干周年慶祝大會上身着藏裝，竟在全區上下得了一個滿堂彩。到底是餓漢才知餓漢飢。小小舉動的效果勝過多少萬元錢。

文化衝突經常表現為對尊嚴的追求。而原有鬥爭哲學中恰恰沒有民族、文化尊嚴的合法空間。“無神論”一條還湊合。就是到今天，藏族同胞也沒有猖狂到非要漢人也當喇嘛的程度。但“宗教是統治階級麻痺人民的鴉片”，却始終有勸人戒烟的味道。殊不知藏文化不僅政教合一，而且萬物歸一，天文曆算、醫學建築、文學藝術，所有文化事情都在宗

教之中。宗教成了鴉片，藏文化就全盤否定了。現在，這兩條不提了，但卻沒有提出新的東西。民族尊嚴的特點是要求平等，平起平座。類似一個單位工作中雖有老板、職員之分，但人格上却應是平等的。行政管理上西藏是中央政府之地方；民族關係則應是不分大小排排座。（像國務院找靈童這類事，實際上是把兩者關係混淆了）現在你有“無神論”和“鴉片”兩條~~手~~，我卻沒有一條對你。只不過你現在不提了，或允許我不提了。顯然，宗教、民族政策只撥亂反正到文革前是遠遠不夠的，要有創新。伍精華提出振興西藏，宏揚藏文化，曾一度激動人心。可惜沒多久，拉薩八角街一役，這些都成了“右傾”的標誌。伍，這位深知少數民族感情的高級幹部灰頭土臉地回北京了。

“雪山獅子國”究竟意味着什麼？值得推敲。“藏獨”不同於“台獨”有三：

一·從大陸的眼光看，台灣人錢多，畢竟孤懸海外。藏族之國，雖人烟稀少，但版圖却極為遼闊。僅以現有藏族自治地區計，便有西藏大區，青海省的玉樹、果洛、海南、海北、貴南五個自治州和一個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薩克族自治州（六個州就是青海全部面積），四川省的阿坎、甘孜藏族自治州（面積近四川省的一半），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縣，雲南省的迪慶藏族自治州。加在一起能劃出去中國現有版圖的四分之一多。更何況整個內蒙牧民都是西藏的黃教意識形態統治。如果再將新疆地區曾有過的“東土耳其斯坦”設計作為連鎖反應考慮進去，這“雪山獅子國”的大象一豎，首先面臨的決不是什麼振興，而是沒完沒了的邊界紛爭。

二·從西藏的眼光看，台灣在事實上獨了四十年。早年獨得風光，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盤踞了二十多年。如今則財大氣粗。相較而言，西藏從五十年代以來就沒有獨過，而且整個經濟、社會生活靠內地“輸血”維持。八十年代以來，西藏全區的財政一直是負數；所有農牧民掌握的開支以外的開支，包括各級政府、學校、醫院、郵政、治安、民政救濟、運輸和國營工業、商業、企業，全靠中央財政撥款；相當於自治區內商品交易總額90%以上的商品，包括糧食、食品、生活日用品、建築材料、燃料、工業用料，靠中央行政性低價調入。西藏除了具有文化上的獨特性外，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一直就不是獨立系統了。可以說，那一天“獨”，那一天“崩潰”。當然，獨立前也可以找到另外的“体外循環”渠道，美元、英磅或盧布什麼的。但是，毛澤東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當然“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用人家錢，勢必要警惕江孜抗英的歷史舊劇以新的形式重演。

三·“台獨”提出的理由無外乎政治、經濟原因。經濟情況可變，政治情況在今天這個大變的世界裡似乎也可變。今天獨出去，明天合回來，也說不定。台灣與大陸在更深的文化層次上完全沒有衝突。同文同種，再獨還是中國人。藏獨，如發動於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則不是一、兩個大姑娘合

親所能挽回的了。

從報刊上知，達賴喇嘛到今天也是爭取自治權和不作中國人分得挺清楚的。

民族尊嚴的實現，歸根結底要依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振興。殺頭不便冠，固然壯烈，畢竟身首異處了。最好的結果是不被殺頭，也不被便冠。這就要勤習武功，提高自身的素質。自己沒能耐，經濟不發達，社會不進步，再強調尊嚴也尊嚴不起來。西藏經濟發展遲緩的根本原因在於人的素質差。我們曾在書中羅列了不少事實來說明這一點。一個簡單的事實：包產到戶一項改革，在沿海省份贏來了空前的發展；在西藏幾乎是泥牛入海無消息。盲目篤信宗教的農牧民經常把所有的錢盡用着蓄長髮的盤纏和到寺院的布施，自己則安居於一貧如洗。個別“萬元戶”好不容易掙幾個錢，却用在比着修經堂上。除了維持簡單生活，大量藏民對艱苦掙錢興趣不大。結果，很多浙江溫州的農民跑到西藏去發了財。

萬物歸一的宗教，藏文化的現有水平，已成為藏族社會進步的嚴重拖累。要想振興西藏、宏揚藏文化，宗教改革已成為歷史進步之必要條件。一九八四年西藏考察之後，我們曾提出過幫助藏族同胞發動宗教改革的建議。當然這不過是一種狂想，儘管黃教就是在蒙古騎兵的幫助下才興盛起來的。宗教改革的玄機，誰也不知如何啓動。但在歷史進步已提出改革要求的情況下，有三個具體條件是需要的。

第一是寬鬆的外部環境。三十年“左”的歷史證明，越是對宗教壓力大，信徒們就越團結，甚至越要緊緊抓住一些古舊的傳統不放；藏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反而不能澄清。相反，前幾年放鬆了許多，求同存異的外部壓力一旦減輕，各寺院間的利益之爭、觀點之爭已開始露出苗頭。

第二是精英階層的認同。考察中我們發現基層農牧民往往溫和、平靜，與世無爭；倒是在成都、北京培養的幹部，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經常發些對現實不滿的牢騷，耿耿於懷民族振興。實際上，越是看到人家的發達，越能體會自己的落後，越激發出強烈的民族感情。估計這一判斷也能反映留英、留美藏胞的情形。白南風曾多次與宗教界上層人士切磋佛祖教誨，發現諸多智者早已悟出有宗教的愚民弊端。宗教改革可以說已在精英階層得到相當成熟的認同。

第三是一位大智大勇，具有傳奇獻身精神宗喀巴式宗教領袖。或是戈爾巴喬夫式坐上第一把交椅的改革家；或是路德一類起於基層的一般僧侶。班禪不幸早逝，即是未死，其影響也遠不如在藏無人不敬的達賴喇嘛。“藏族人民之精神領袖”應全面檢討藏文化，沉澱其糟粕，宏揚其精華，奠定藏族新生之精神基礎。宗教改革，此乃藏族歷史上大慈大悲的無量功德。